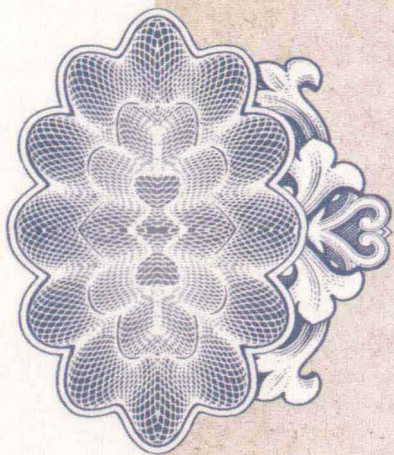


〔英〕沈艾娣 (Henrietta Harrison) 著
赵妍杰 译

梦醒子

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
(1857—1942)

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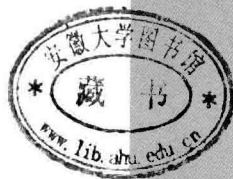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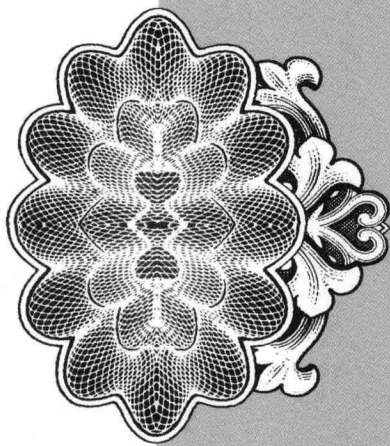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博
雅
史
学
论
丛

海

究

史
学
论
丛
·
海
外
中
国
史
研
究



梦醒子

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
(1857—1942)

[英] 沈艾娣 (Henrietta Harrison) 著
赵妍杰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8-145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英)沈艾娣(Harrison, H.)著;赵妍杰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8

(海外中国史研究)

ISBN 978-7-301-22865-4

I. ①梦… II. ①沈…②赵… III. ①刘大鹏(1857—1942)—人物研究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2223号

© 2005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书 名: 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

著作责任者: [英]沈艾娣 著 赵妍杰 译

责任编辑: 张 晗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865-4/K·097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67315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10.75印张 150千字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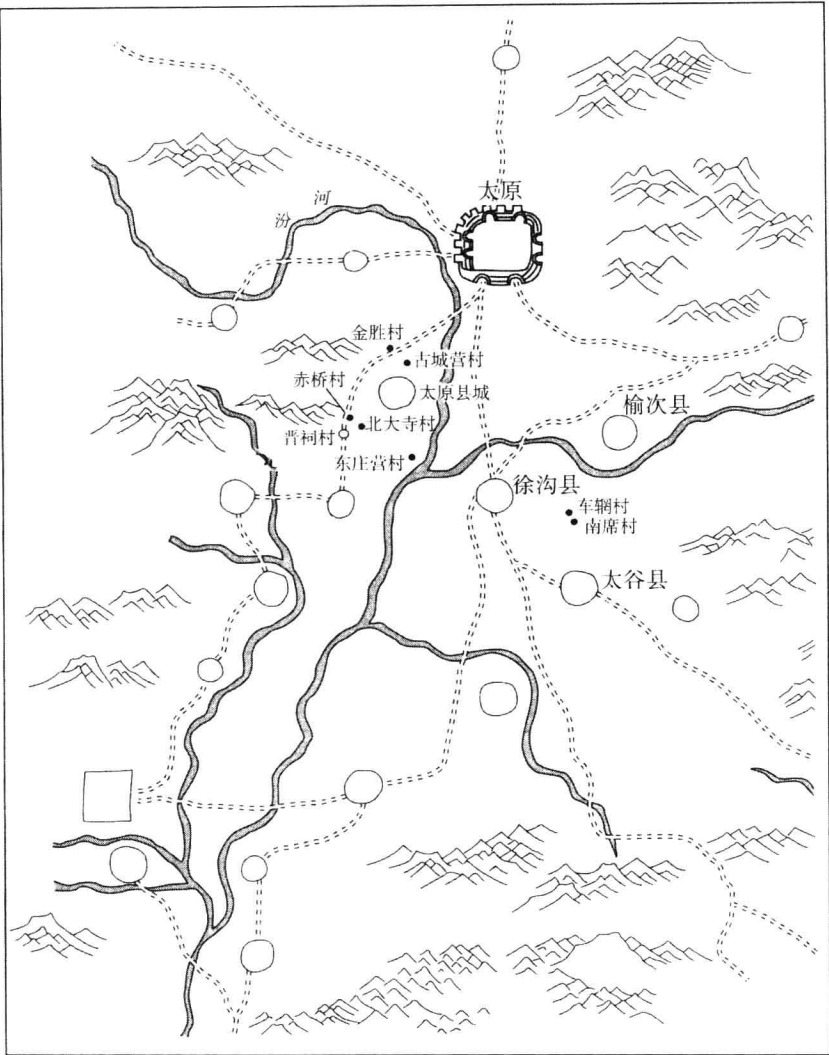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刘大鹏

赤桥刘牛忠先生惠允使用



山西中部

来源：美国布道会山西传道区，据沈桂芬山西省舆图改制，1881年

中文版序

我写《梦醒子》并非面向中国的读者。那时我以为,这不是一个中国史家会在著述中大量讨论的故事,而是他们所熟悉的生活背景的一部分。作为一名年轻的西方学者,我对中国的认识多半来自于书本。我对一位举人还要不辞劳苦地为自己的院子铺石块,甚感惊讶。但当我和老一辈中国学者讨论自己的写作计划时,他们经常向我提及年轻时在乡下熟识的这类老先生。他们称之为“私塾先生”,这个词很难在英文中找到对应的翻译。当然这个称呼并不完全适合刘大鹏,因为相对于坐馆,刘氏把更多时间花在经营煤矿和务农上。但是“私塾先生”确实描画了这类乡贤——他们受过很好的教育,却依然可能家境贫寒。且在我看来,对刘大鹏感兴趣的中国学者并不需要一本他的传记,他们可以径直去读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乔志强点校本)。尽管该版日记删减颇多,但是基于该日记和刘大鹏的其他文字资料,史学界已有一些出色的研究,比如罗志田、关晓红等人的作品。这些作者熟悉中国传统典籍,故而在阅读刘大鹏日记时驾轻就熟,尤其是他们对刘大鹏的政治思想了解之深,远非我所能及。^①

我所预想的读者是英国和美国大学的本科生。因此我在书中对著名的人物和事件都作了简单的解释。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原谅此举,因为我的目的是用刘大鹏的故事向西方的大学生介绍近代中国的乡村,为他们展现 20 世纪前期一个中国乡村日常生活的鲜活面貌。我也希望能够让这些西方学生反思现代性所带来的悲剧。中国和西方的高中教科书都倾

^① 这些作品都在本书的书目中列出。随着对晚清和地方史兴趣的兴起,近些年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作品,例如赵素梅《成就内圣人格——刘大鹏人生观初探》(山西大学 2006 年硕士论文)、行龙《内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迹》(《清史研究》2005 年 2 期)等。

向于将现代化描述成向美好生活持续迈进的过程。我希望在大学里学习中国历史的学生能想到这些遭受进步之苦的人——个人、家庭、地方，甚至或许是整个的中国乡村人口。我希望他们了解，像刘大鹏这么一个正直的好人会将所发生的变化视作有悖于道德。我希望他们通过阅读刘大鹏的故事，能够对他的态度有同情之理解，这将让他们对现代化过程有一个更广阔的认识。^①

由于本书被广泛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的课程，很多西方的大学生确已读过此书。我有些惊讶的是，中国的《历史研究》曾发表了一篇本书的书评，同时很多中国学生对本书也很感兴趣。不同于他们的长辈，对于这一代学生而言，刘大鹏日记所描绘的世界已经不是他们生活记忆的一部分。也有读者对书中关于现代化的论述、情感的历史、清朝覆亡后儒家伦理不断变化的特性以及本书的其他主题感兴趣。但是我想对于这些读者来讲，这本书最有意义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微观史的范例：对一个相对不为人所知的个体生命进行细致的研究，旨在展现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世界。

微观史学并非历史写作的新文类，但是中国的读者可能并不特别熟悉。这一文类肇端于研究早期近代欧洲的社会史家。其经典著作主要是对法国和意大利的研究，例如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乔瓦尼·莱维(Giovanni Levi)等人的著述。^②这些史家挖掘早期近代法国和

① 另一本目的相似的书是张邦梅(Natasha Zhang)的*Bound Feet and Western Dres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7)，书中记述了张幼仪的生活，她是徐志摩想要实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桩现代离婚时抛弃的妻子。有中译本：《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谭家瑜译，台北：智库文化，1996年。

②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 Century Miller* (《以奶酪与蛆虫：一个十六世纪磨坊王的宇宙观》)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最早于1976年以意大利语出版)；Natalie Zemon Davis,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马丁·盖尔归来》)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Giovanni Levi, *Inheriting Power: The Story of an Exorci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最早于1985年以意大利语出版)。书中所涉及的西文著作，凡已出版有固定译名的，将注明中译名称，否则不注。——译者注

意大利的丰富档案资料,尤其是国家和教会法庭的司法调查,来了解普通人的生活经历。他们深受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等人类学家的影响,后者通过在文化语境中分析一件件看似不重要的事件来阐释更广阔的文化面相。^①他们作品的另一大特点在于他们对叙事的运用。史家通过档案来展开特殊事件背后的故事,或是考察原本籍籍无名的个人的生活,而读者跟随着作者的笔端。这些书读起来很有趣,将读者带入故事之中,但它们也处理更广阔的主题。它们并不是案例研究——通常是用一个例子证明、证伪或推演一个更大的理论。相反,它们通过对人类生活和动机的具体分析来颠覆已经被接受的历史,揭示理解过去的别样途径。

微观史早期的代表作多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并不意外,这一风气也影响到当时研究中国的西方历史学家。史景迁的《王氏之死》(逃离夫家的贫妇)和《胡若望的困惑之旅》(讲述中国人胡若望与早期天主教传教士的欧洲之旅,但最后胡氏发疯了)都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②然而明清史料中并不存在像欧洲研究中所运用的丰富的地方档案。同时,欧洲的微观史多关注不为人所知的个人和事件。这些远非中国史家的兴趣所在,那时他们主要关注阐发和辩论民族历史的宏大叙事。微观史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要撼动这种宏大叙事的整体化倾向。因此,这一欧洲的史学写作方法并未立即在中国史学界流行开来,也就不足为怪了。

事实上,《梦醒子》并非典型的微观史。它并非基于档案研究,而是以刘大鹏的日记和其他作品、已出版的地方史资料和口述访谈为材料。但是本书借鉴运用了微观史研究方法的一些基本元素——对个体生命和观念的具体研究、一种叙事的结构,尝试针对20世纪初山西农村生活的本质,提出更深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史学界渐渐兴起对社会史、地方史

① Clifford Geertz, "Deep Play: Notes on the Balinese Cockfight", *Daedalus* 101.1 (1972).

② Jonathan D. Spence, *The Death of Woman Wang* 原文为 human hetry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87)《王氏之死》; Jonathan Spence, *The Question of Hu* (New York: Knopf, 1988)《胡若望的困惑之旅》。

和以人类学方法研究历史(人类历史)的兴趣。学者们也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地方档案,尤其是1949年之后的档案。与此同时,对口述史的兴趣也日渐广泛。在这样的语境下,专业史家、学生和其他读者可能更有兴趣读到那些让他们接触普通民众生活经历的作品。我希望赵妍杰雅致的翻译能够满足他们的兴趣。

沈艾娣

2011年12月13日

致 谢

请允许我表达对科大卫教授的衷心感谢,是他推荐我研究刘大鹏,让我从中获益良多。牛津大学圣·安妮学院的青年学人研究奖学金让我得以开始这项研究,随后利华休谟信托基金会(Leverhulme Trust)和高等研究院给了我到普林斯顿大学访问一年的机会,其间颇受启发,并最终成稿。在牛津、普林斯顿和利兹大学的师友对此书倾注了大量心血。我尤其要感谢的是:潘妮·弗兰克斯(Penny Francks)、季嘉珍(Joan Judge)、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琼·斯科特(Joan Scott)和一位利兹大学本科生,他们花了大量时间阅读本书的大部分草稿。陈怀宇帮助我翻译史料。尽管天各一方,程美宝、雅各布·艾费特(Jacob Eyferth)和艾志端(Kathryn Edgerton-Tarpley)和我讨论了书中的许多重要问题。

如果没有大量在山西考察的时间,我是不能完成这本书的。我要感谢给我提供考察经费资助的英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院、各个大学的中国委员会、欧盟—中国学术网络。当然,若离开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张正明教授无微不至的关照,我的研究在抵晋后也不可能顺利开展。北京师范大学的毕媛陪我一起作了许多访谈,并参与之后的讨论。晋祠二中的武炯生不仅为我安排了很多访问,并且赠予我多件由他誊录的碑铭复印件,而且他之后又好心地访问了他的邻居和亲戚,并发来详细记录。最后,我要感谢的是所有花时间来向我讲述他们的生活、历史和村庄的人们。正如读者所见,我最诚挚的谢意要送给刘佐卿,他花了大量时间和我谈他的祖父。这些聊天不仅让我更容易理解书面的记载,了解刘家经济景况的细节,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它让刘大鹏在我眼前变得生动起来。

目 录

中文版序	1
致 谢	1
序 言	1
第一章 写作	8
第二章 儒生	17
第三章 孝子	42
第四章 议士	69
第五章 商人	94
第六章 老农	114
尾 声	133
参考书目	143
索 引	155
译后记	162

序 言

如今人们可以乘公交车到赤桥村。1996年我第一次到这儿，穿越稻谷地，到了村庄，司机让我在路的尽头下车。在赤桥，这样的汽车很多都是赤桥人自己拥有和经营的，但是乘务员对我要去那里表现得很惊讶。这个村庄坐落在平原的边缘，它的主干道蜿蜒到小山丘上，是一条从省城太原到本省南部的古道。道路两边的民居多为低矮的传统院落，就像久已废弃的店面，和它们旁边的土路颜色一样。其中的一座就是我要来看的刘大鹏家。刘大鹏的父亲买下之前，这房子原本是当铺，建筑结实，入口处有小门廊。健谈的老人把我领进房间，告诉我门廊屋檐下曾挂着一块匾额，写着“父子登科”。如今，匾额已去，门后影壁上的精美雕刻也已被削去，只粗略地涂了一层石灰。掀开竹帘，我们绕过拐角，进入四间房屋围着的院子中。这个老人大声喊着刘家人，开玩笑说这是村里唯一由举人铺石的四合院。驻足于此，我们眼前是刘大鹏父母曾居住的主屋，现在住着他大儿子一家。左手边是一间面南且稍小的房屋，刘大鹏生前一直住在这儿。一位穿着黑色衣服的老太太走出来，告诉我她是刘大鹏的五儿媳妇，接着领我们进屋。狭长的房间里，一头是砖砌的炕，菜板和餐桌倚在墙边。另一头隔出里屋，之前也有和对面一样的砖炕，现在摆着两张大铁床。我们进屋时正对着一张刘大鹏的大幅肖像：一本正经——絮得厚厚的丝织上衣凸显了他的严肃和凝重，眉头稍蹙，正对着我们。

刘大鹏家并非我所预料的样子。那个老人笑称石板是举人铺的，我并不相信。清代有功名的人当然不铺石板。房间之小也让我惊讶。我此处的笔记里记了一连串问题：这是刘大鹏居住过的唯一的院子么？他所有的儿子也住在这儿？刘大鹏的儿媳妇和刚嫁进刘大鹏大儿子家的年轻

1

2

序
言

1

3 女子很惊讶于我的问题,但他们的回答相当明确:刘大鹏、他的妻子、父母、五个儿子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都住在这个院子里。我知道刘大鹏和他的儿子都是举人,而举人在清末是颇具声望的。尽管他们没能考中进士而入仕,但举人身份也足以让他们成为张仲礼在1950年代的著作中提到的所谓的上层绅士。^①他们之下还有很多没能中举的生员。所有这些在科举中取得功名的人形成了中国史家一直提及的“绅士”,并且被描述成在国家和大众之间扮演着协调人的角色。^②他们被看作浸淫在通过教育和考试习得的儒家文化里。晚近的研究强调其他权力来源的重要性,这类研究者描写的精英由这些有功名的人和通过贸易、票号发家但不具备功名的有钱人共同组成。^③其他学者研究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且勾勒精英的生活和一般百姓的区别,例如写诗、作画和收藏典籍。^④阅读这类已有研究至少给我一个印象,即绅士们生活得富裕,诗书之家生活在宽敞的房间里。

当然,传统中国也同时存在着另一种有功名之人的生活景象——贫寒的塾师。众所周知,身无分文的儒生急切地渴望能通过考试获得官位,这正是《儒林外史》挖苦的对象。在我所有的中国朋友看来,刘大鹏正是这样一类人。像刘大鹏这样的人并非一定要坐馆,贫寒的塾师也有些陈词滥调,但是其中反映出的现实却常常被忽略。尽管饱读诗书的贫寒之家也曾出现在英文的中国研究文献中,但是他们的声音多在精英和大众的简单划分中失语。^⑤这种区分吸引着我們。我们想研究的要么是位高权重者,要么是普罗大众。我们这些外国研究者做如此的区分是为了我们所研究的异国社会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但是我们也过滤掉许多研究

① Chung-li Chang (张仲礼), *The Chinese Gentry* (《中国绅士》), pp. 6-7.

② Ch' ü (瞿同祖), *Local Government* (《清代地方政府》)。

③ Beattie, *Land and Lineage*; Schoppa (萧邦齐), *Chinese Elites*; Meskill, *A Chinese Pioneer Family*。

④ Clunas (柯律格), *Superfluous Things* (《长物志:中国前现代社会的物质文化》)。

⑤ 参见 Smith (明恩浦), *Village Life in China* (《中国乡村生活》); Hinton (韩丁), *Fanshen* (《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 Barr, "Fourth School-Masters"; Yeh (叶文心), *Provincial Passages*; Hsiung (熊秉真), *Treading the Weedy Path: T' ang Chen (1630-1740) and the World of Confucian Middlebrow*。

中的困难之处。^①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质疑我们对中国社会的划分：士绅、商人、农民、精英。我们使用的这些术语究竟有什么含义？遑论家庭，又有哪一个人能够完全归于其中一类？如果身份认同是多重且变化的，那么这又将对我们所讲述的历史叙事有怎样的影响呢？

来到刘家和他的家人见面，也让我思索这些士绅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命运。1997年当我第二次来到这个村子，人们介绍我认识一个“地主的儿子”——一位姓武的老人家，1949年后曾在造纸厂当过工人。尽管是有名的技工，他还是很紧张，并且逃避问题，这也正是他1949年后所处社会地位的正常结果。刘家倒没有这样的特点。事实上，有一次，刘大鹏的大儿媳妇在我面前不停地大声责骂支书，控诉1960年代他们家大门影壁上的装饰如何被破坏掉。刘家人骄傲地告诉我，刘大鹏的藏书曾经有一整个橱柜那么多，但是却没提及自己受教育的事情，他们清晰地把自己归为村中的普通人。虽然学者们认为社会流动性是中国村庄的重要特点，但是史家一直倾向着眼于成功地维持社会地位并且能适应变化的精英阶层。他们看到地方精英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活动，努力动员人们支持变革和现代化。^②他们也认为，传统精英本负有保护村庄免受政府横征暴敛之责，而在20世纪初税收不断增加时，他们失去了权威的正当性，而此时这些精英也逐渐移居到城镇中。^③在所有这样的图景中，传统的地方精英仍然保有他们的某些经济、社会地位。刘大鹏的例子不怎么支持这些论述。像他后代们的现状告诉我们的，刘家在1949年之前已经衰落了。既然我们认为既存精英都得以延续，为什么刘家却日渐没落？当辛亥革命让他们获得官职的梦想破灭后，这些既存的士绅们又如何维持自己的地位呢？这些问题引领我思考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儒家思想，第二个是关于山西省。

儒家思想究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当国家放弃长

① Wyatt MacGaffey, *Kongo Political Culture: the Conceptual Challenge of the Particular*.

② William T. Rowe (罗威廉), "Success Stories: Lineage and Elite Status in Hanyang County, Hubei, 1368-1949".

③ Duara (杜赞奇),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久以来对儒家正统性的维护,它在人们生活中的角色有何变化?刘大鹏仍然坚持着学童时和随后在省城太原的书院里习得的理念。他不停地恼怒自己未达到习得的较高标准,尤其是他认为自己对父母尽孝不足。他努力实践儒家君子之道的行为并不常见:他在书院的同学们多来自富裕之家,他们嘲笑他的那股认真劲儿,村里的邻居和他经常就何为恰当的举止而产生龃龉。但是,即使很少人像他一样坚持,他们却容忍甚至尊敬他,因为儒家思想曾经被国家认可和提倡。直到20世纪之后,国家渐渐放弃儒家价值,而强调新的民族主义和系于国际贸易、大规模城市工业的现代化。儒家思想的论说失去了政治上的流行性,以至于官员们不再听取基于儒学理念的论说,刘大鹏也失去了他所接受的教育曾经赋予的公共话语权。但是儒家思想深深地植根于地方社会,并没有简单地消失。对于刘大鹏来说,努力像儒家士绅一样处世构成他身份认同的重要部分,即便他的教育资格已经不具政治实用性,这种努力依然标志着他的身份。他试图将自己的这种身份化为家庭收入的各种方法表明了国家放弃儒家思想之后很久,儒家思想在何种程度上依旧是地方制度的一部分。尤其是强大的法律框架缺失的情况下,儒家价值观念继续在商业领域扮演重要角色。刘大鹏曾借煤窑的开采、经营和投资谋生,正是在煤矿业的经营管理之中应用着这样的价值观念。调解商业纠纷的大量努力更强化了他在村里商人中的地位,他的价值体系在这样的努力中被认可和接受。儒家思想依旧存在于生活中很多方面——商业、家庭和农业。但是,在缺少国家整合力量的情况下,儒家价值在以上的组织制度中均有所发展变化。

本书中,我使用儒家思想(Confucianism)一词,即刘大鹏经常指的“圣贤之道”或“孔孟之道”。^①在他看来,这正是孔子及其弟子的真正教诲。现代学者们并不同意他的看法,他们可能将他的思想看作新儒家,强调它来源于12世纪,然而他的思想却为他的同时代人所分享。我使用儒家思

^①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页143。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手稿)》(山西省图书馆馆藏)光绪十八年(1892)十月十五日。有可能的情况下,我尽量引用刘大鹏已经出版的作品,但是乔志强的标注本是大幅删减后的版本,因此我经常需要引用手稿本。对于手稿本的引用多为阴历日期。

想一词,部分原因是它反映了刘大鹏的观点,也因为宋代儒学和清代的正统一样,都仅仅是这一宏大的哲学流变中的一个短暂瞬间。刘大鹏本身的儒家思想并非纯粹的宋学,它也受道家哲学观念的影响。但是,这两种哲学观念通过同一套文本传统影响到他,刘大鹏也从来没有公开区分两者,而是作为儒生和未来的官员同时接受了两者,声称自己仅是遵从古代的圣贤之道。

若是在更早的时代,刘大鹏可能会为儒家辩护,使其同大众文化的某些形式相区别,但事实上,他越来越将儒学和他所指的“新”政对立起来。例如他曾言:

近年来为学之人,竞分两途,一曰守旧,一曰维新。守旧者惟恃孔孟之道,维新者独求西洋之法。^①

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他观察到“维新者”及其政策在政治上不可阻挡的上升态势,并为之哀叹。我将这些人称作现代化者,相应地把他们的政策看作现代化的努力。因为在西方的语言里任何政府政策都可能是新的,而刘大鹏所看到的则是一种构建在西化的未来图景之上的特殊政治进程。他将此与儒家思想对立起来,因为儒家追溯的是古代的圣贤。

以上的故事引领我进入了另一层面的历史,即与现代化观念紧密联系的社会变化所导致的,山西的乡村及它与商业繁荣和政治权力渐行渐远的故事。我访问赤桥村之后又去了刘大鹏曾坐馆多年的南席村,很明显这些村镇曾经繁荣过。赤桥的大街两边曾经布满商铺,如今已改砌为民居。从大街走下去,狭窄的马路一直通到一个大工厂,里面满是废弃的烟囱和棚屋,村里的造纸厂曾经坐落于此。南席村和邻近的车辆村中曾经宏伟奇丽、装饰精美的院落和过道,如今挤满了贫民,好像他们只是寄居在那里一样。^②这当然部分是由于1949年后共产党在1950年代和60年代通过土改和工业国有化重新分配了财富;但这也是更长的历史进程

^①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页143。

^② 因此车辆已经被修缮,重新装修成为旅游胜地。

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共产党的政策在事实上保存了一些古建筑，这样的建筑在1949年前要么被破坏，要么被拆了卖木头。曾经富足的山西乡村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开始日渐贫困，这要归因于一系列改变了山西地理的政治变革。外蒙古独立、俄国革命、国防重心和贸易中心由内陆转移到东南沿海——所有这些发展将山西从一个贸易主干道变为一个孤立的、交通不便的省份。与此同时，国家和省级政府共有的现代化观念强调将城市化、工业化、出口导向型商业作为强国的基础。^①部分地区因此受益；山西的村落则不然。20世纪初到80年代，山西中部的村落由繁荣的工商业中心变为贫困的、基本上是农业为主的地区。

这些都是宏大的主题，但是我将通过个人的故事来展现它们，因为这正是我感知这些宏大主题的方式。这一取向也让我能够感受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到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如何在实践中互相影响。只有在个人层面上，我们才能看到孝道如何被践行、如何受政治变革影响；假如我们冒进到集体层面，我们将错过很多有趣的故事。同样的原因，我大体上避开了重大政治事件的叙事方式。造反和革命渗入日常生活中，从而增加了其戏剧性，而且最终很有可能改变了它。但是大多数人只是当中的观察者，他们生活中的变革也多半在更长的时段里发生。进而言之，大体上本书以刘大鹏的日记为基础，其中1900年、1908—1912年的内容早已散佚。有可能在日记的手稿本被送进山西省图书馆保存之前，有人将其认为最为重要的年份取走了——其中恰好有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许从刘大鹏的日记中可以重建这些事件的某些细节，事实上刘大鹏的确是山西义和团运动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但这些资料的缺失恰好让我更多地关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和个人经历。^②

对个人的关注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问题，即刘大鹏具备代表性么？

① Pomeranz (彭慕兰),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

② Harrison (沈艾娣), "Village politics and national politics; the Boxer movement in central Shanxi"; Paul Cohen (柯文), *History in Three Keys*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化的义和团》)。